

北京图书馆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交换图书十周年

林 敏

早在一九五三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反侵略战争刚结束不久，北京图书馆就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朝鲜科学院图书馆、金日成大学及朝鲜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建立了图书交换关系。十年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换了大量的书刊。以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六年为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图书馆每年寄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的书籍、报纸、期刊大约平均在一万六千份（册）左右，一九五七年曾达到二万零五百零二份（册），其中书籍三千三百五十册，期刊一万零五百五十二册。同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寄给北京图书馆的书籍报刊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以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为例，每年平均为六千六百多份（册），交换数量最高的一九五六年达到八千一百多份（册），其中书籍一千九百余册，期刊一千余册，报纸五千余份。

北京图书馆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图书馆交换的书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包括两国出版的新旧书籍、期刊、报纸和显微胶卷等。书籍方面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类。报纸方面有中央的、地方的和专业的。可以说，凡是两国出版的印刷品，双方都尽力设法供给对方，以满足两国读者的需要。

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几个大图书馆里，藏有十年来从中国寄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我国的古代巨著《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诸子集成》、《丛书集成》等。历史方面有：《廿四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简编》等。科学方面有：宋代建筑家李诫的《营造法式》、明朝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的著作。文学方面的书籍占的比重较大，从秦以前到现代举凡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寄给了朝鲜图书馆，如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史记》，魏晋南北朝的《三曹诗选》，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

易的作品，宋代陆游、辛弃疾的作品以及明清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现代杰出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诸人的作品等。

除了书籍之外，北京图书馆还经常把《人民日报》、《红旗》、《中国科学》、《人民文学》等一百二十多种报刊寄给朝鲜。

北京图书馆里，目前藏有朝文书笈报刊约四万余册。这些书籍报刊主要是通过交换得来的。在收到的书籍中，有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各种著作，如《金日成选集》、《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千里马作业班运动》及《青山里指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也有朝鲜古今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的作品。历史方面的著作有：《朝鲜通史》、《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朝鲜人民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古典文献方面有：《三国史记》、《高丽史》等。语言学方面有《朝鲜语语法》和《朝鲜语辞典》（共八卷）等。文学方面有朝鲜著名作家李箕永的《图们江》、《故乡》、宋影的《白头山在哪里也望得见》、朴雄杰的长篇小说《祖国》，尹世重的小说《考验》以及《朴世永诗选集》、《朴八阳诗选集》等。此外还有《春香传》、《沈清传》和《红色宣传员》等著名剧本。最近收到的有《高句丽壁画图案》、《朝鲜古代建筑艺术》、《郑茶山和他的文学》、《大东水经》、《经世遗表》、《高丽史》和朝鲜出版的汉文书籍《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报告》、《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索引》等等。朝鲜图书馆这几年寄给北京图书馆的报刊总计有一百二十多种。一九六三年到的有六十余种，其中包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以及全国性的刊物《民主青年》、《教育新闻》、《文学》、《少年儿童》等。期刊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劳动者》及其他全国性刊物《朝鲜画刊》、《青年生活》、《朝鲜妇女》、《经济知识》、《财政金融》以及《朝鲜艺术》、《朝鲜美术》《千里马》等。朝鲜同志为便利我国读者的阅读，曾主动地将他们出版的中文版书刊寄给我们，这些书刊也很受我国读者的

欢迎。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中央圖書館寄給北京圖書館的書籍每種有三份，我館除每種珍藏兩份外，其餘的一份則根據書架的性質分別轉贈給北京大學東語系、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延邊大學圖書館等單位。

雙方圖書館還互相交換朝文書籍漢譯本和漢文書籍的朝文譯本。北京圖書館收到的有《毛澤東詩詞選》、《三國演義》、《青春之歌》、《魯迅選集》、《女神》、《屈原》、《暴風驟雨》等。我們寄給他們圖書館的有：《趙基天詩集》、《崔曙海小說集》、《朝鮮現代戲劇集》等。我們寄給他們圖書館的有：《金日成選集》、《趙基天詩集》、《崔曙海小說集》、《朝

鮮現代戲劇集》、李箕永的《土地》、千世峰的《戰鬥的村民》等。

為使這千冊萬冊書刊寄送給對方，雙方有關的工作人員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辛勤勞動。諸如每一批書刊都要經過選購、打包、付郵等手續，才能到達目的地。到後還需要卸運、拆包、編目、入庫，最後還要向讀者進行宣傳和推薦。

這些平凡而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都幹得很快樂，很帶勁。我們想朝鮮的同行們一定也是這樣的，因為這項工作有利於中朝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學習，也有利於中朝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和團結的不斷增強。

治籍瑣談

· 方 笑 ·

《黃氏逸書考》

此書為清代甘肅黃奭輯。奭字右原，以資入為刑部郎中，道光中以順天府吳杰薦，欽賜舉人。嘗執經于江鄭堂之門，師承其輯佚意旨，搜集逸書二百八十餘種，匯為《逸書考》。書分四類：一曰漢學堂經解；二曰通緯；三曰子史鈎沈；四曰通德堂經解。每成一種，即以付刊。全書版成，值太平軍興，即以其版皮諸揚州樊氏鎮蕭寺中。光緒間，奭子灝、澧出資購歸，已多散佚。書賈取其完整者二百十五種，為之董理印行。因未得其書名，遂以第一類漢學堂經解之名，而題為《漢學堂叢書》。此即清光緒十九年印本。辛亥以後，同里王鑑購得此版，又從秦更年處獲初印樣本，據以校補，共有二百八十五種，並因各類篇首下方，統曰《逸書考》，遂改題為《黃氏逸書考》。至此始復舊觀。此即乙丑年甘肅王氏懷衽室補刊印本。民國二十年間，版又轉歸南京萃文書局朱長圻。朱氏核其原目，仍有缺遺，延叶仲經氏輯補，並將其蘇州所得未刻原稿九種，一併補刊，仍從原題《黃氏逸書考》。正待付印，抗日戰起，因而未果。解放後，移歸揚州地方公有，由書肆印售。當以不敷預約之冊數，湊他版六種作為附刻以足之。此即民國二十三年朱長圻補刊解放後印本。當時朱氏曾提出撤除附刻之議，未悉再印時已否改正。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謂附刻為朱長圻所補，或未明其刊印之原委也。

大題小題

群書題記中，有大題在下、小題在上之稱。此

何解？大題指全書之總名，小題指一書之篇名。最早刻印之書，以書名刊下，篇名在上，如《史記》每卷首行上題本紀列傳等，其下則題《史記》，即此謂也。《經典釋文》：“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并大題在下，即謂小題在上。詩疏：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題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尽然”。亦足証此說。何以有此式，是源于簡策。一簡所容字數，少則八、九字，多亦不過三十字左右。全書之簡數既多，勢不得不以一篇成一簡策。如《漢書藝文志》稱某書若干篇，是以篇為單位，合各篇而為一書，題書名于贅策，以綴首編。迨簡策廢，以縑帛為書，式成卷子，題書名于簽，而懸于軸上。唐韓愈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標牙簽，新若手未觸”。是簽猶有贅策遺意。雕版未興，初據卷子形式復刻，而移簽題于卷首下，故宋刻《史記》大題仍在下也。

點發、圈發

漢字由形、聲、義三者構成。同一字有四聲，聲不同而義亦有別。某字應發何音，在古代典籍中，以點标注于一字應發之聲位上，名之曰點發。宋以後易點為圈，故又名曰圈發。如宋相台岳刻《五經》，于一字異音皆加圈識之。一字数音者漢時恒借他字以比其音。漢鄭康成所謂倉卒無字，以音類比方假借者也。自齊梁人分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末附論史諸例，其說曰：“元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點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在右上角，入聲在右下角。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例如从字，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但容反，子勇反，相勸也；又從用反，侍從也；又足用反，恣也。張氏所謂點發者如此。其言字或數音，觀義點發，蓋謂就其字義，觀于書之如何用法，而加點以明之。